

语言接触引发的框式虚词及其演变推测*

吕 嵩 崧

[提要] 语序类型有差异的两种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可导致框式虚词的形成。框式虚词是固有形式或较早形式向模式语形式演变的中间阶段。

[关键词] 语言接触 框式虚词 语法化

一 引言

不少学者对框式虚词给予了关注。刘丹青(2002)对汉语中的框式介词进行了研究,指出框式介词是由前置词加后置词构成的、使介词支配的成分夹在中间的一种介词类型。曹志耘等(2000:432-433),邓思颖(2006a),曹广顺、遇笑容(2010),汪化云、占小璐(2014),张竞婷(2015),吕嵩崧(2017, 2020),王丹丹(2018),杨永龙(2019),汪化云、姜淑珍(2020),荆亚玲、汪化云(2021)等对其他框式虚词进行了讨论。

本文认为,框式虚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或功能一致或相近的虚词(标记)分别居于其所修饰/支配/标注成分两侧而形成的虚词类型。我们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内语言中的框式虚词作跨语言考察,对其形成进行讨论,对其演变趋势进行拟测。

二 相关语言事实

金立鑫、于秀金(2012)指出,根据 Dryer 和 Haspelmath 的报告,VO 语言和 OV 语言呈现出 15 对相关的倾向性对立。这些倾向性对立在 VO 语言和 OV 语言的句法配置中呈现镜像语序,语序类型有差异的两种语言或方言也就具备了形成框式虚词的基础,二者的接触可导致框式虚词的形成。

目前观察到可形成框式虚词的句法组配主要有:

第一,附置词^①和名词短语。VO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附置词—名词短语”,OV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名词短语—附置词”,VO 语言和 OV 语言接触可形成框式附置词。

第二,否定助动词^②和动词短语。VO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否定助动词—动词短语”,OV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动词短语—否定助动词”,VO 语言同 OV 语言接触可形成框式否定标记。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壮傣语支语言地图集(21BYY039)”及重大项目“功能一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15ZDB100)”的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感谢。

^① 金立鑫、于秀金(2012)所指附置词实为动源附置词。本文亦是。

^② 本文称“否定标记”。

第三, 形容词和比较基准。VO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形容词—比较基准”, OV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比较基准—形容词”, VO 语言和 OV 语言接触可形成框式比较标记。

第四, 动词和方式副词。VO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动词—方式副词”, OV 语言的相关语序为“方式副词—动词”, VO 语言和 OV 语言接触可形成框式副词。

在现代汉语方言以及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中, 我们都能观察到框式副词、框式比较标记、框式附置词^①、框式否定标记^②。除以上 4 种主要框式虚词外, 在元代汉语中, 还可观察到其他框式虚词。

(一) 框式副词

汉语南方方言、壮侗语符合 VO 语序, 汉语普通话及北方方言符合 OV 语序。汉语南方方言和壮侗语借入普通话的方式副词后, 形成框式副词。我们还观察到, 不止方式副词可形成框式副词, 其他副词也可形成框式副词。

1. 香港粤语的框式副词

(1) 佢当然去定啦(他当然去了)! (邓思颖 2006a)

例(1)中, “当然……定”为框式副词。“定”是粤语中较早层次的表肯定的语气副词, 位于动词之后。粤语是 VO 特征最典型的汉语方言(刘丹青 2001b), 副词居于动词后符合 VO 语言的共性。“当然”是在清代才演变为表示肯定态度的语气副词(余珩 2017), 其居于动词前, 与当代官话方言、普通话修饰语一般居于中心语前是一致的, 与汉语具有一定的 OV 语言的语序特征是相符的。因此, 可以推断, “当然”的层次较“定”为浅, 二者分别按 OV 语言副词通常居于中心语前和 VO 语言副词通常居于中心语后线性分布, 形成框式副词。

2. 南宁粤语的框式副词

(2) 支歌我哋唱得有整齐, 重新唱过一次(这歌我们唱得不整齐, 再唱一次)。(林亦、覃凤余 2008:333)

例(2)中, “重新……过”为框式副词。根据覃凤余、吴福祥(2009), “过”在粤语中可充当再次体标记, 功能与“重新”一致, 居于中心语后; “重新”是表反复的频率副词, 从普通话借入, 居于中心语前, 与其在普通话中的句法位置一致。可与“过”构成框式副词的还有“再”, 如“印有得清楚, 再印过(印不清楚, 再印一次)。”(林亦、覃凤余 2008:333)

3. 百色粤语的框式副词

(3) 啲只村全部系壮族晒(这个村都是壮族)。(吕嵩崧 2019)

总括副词^③“全部”从普通话借入, 层次晚近(吕嵩崧 2019); 句末的“晒”为百色粤语固有词, 与“全部”功能一致。二者分别居于中心语两侧, 形成框式副词“全部……晒”。

4. 高山汉话^④的框式副词

(4) 我们全部张家完(我们都是张家)。(吕嵩崧 2019)

^① 此结构由借自汉语普通话或其他北方官话的前置词和当地汉语方言的格标记组成, 我们称为“框式附置词”。

^② 否定标记, 一般也视为副词, 为与金立鑫、于秀金(2012)一致, 我们在此将其与其他副词分开。4 类框式虚词不按金立鑫、于秀金(2012)的排序, 而以观察到的数量多寡排序。

^③ “总括副词”, 吕嵩崧(2019)称“全称量化词”。下文同此。

^④ “高山汉”是广西百色、河池一些地方的人对居住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地区广西一侧的部分汉族的称呼, 其使用的“高山汉话”属西南官话。

句末的“完”复制了壮语“完毕”义语素的总括副词功能，同时复制了壮语中状语居后的语序（吕嵩崧 2019）。“全部”与“完”在中心语两侧同现，形成框式副词“全部……完”。

5. 那坡官话^①的框式副词

(5) 今天太冷多（今天非常冷）。（笔者田野调查语料）

“太……多”为框式副词。据吕嵩崧（2020），壮语“多”义语素演变出程度副词功能，指程度高。那坡官话的“多”复制了壮语“多”义语素的程度副词功能，同时复制了壮语中状语居后的语序；来自普通话的“太”，则居于中心语前。二者同现，形成框式副词。

6. 吴语的框式副词

吴语中也存在一系列因接触形成的框式副词。曹志耘等（2000）认为处衢方言中意义一致的“……添”“再……添”“再……”是由深至浅的三个层次，后两个层次因接触形成。汪化云、占小璐（2014）及汪化云、姜淑珍（2020）列举了吴语中一批因接触形成的框式副词^②。

7. 壮侗语的框式副词

壮侗语中的框式副词比比皆是。例如：

(6) $\text{na}^2\text{sjen}^3\text{fan}^2\text{hai}^1\text{man}^1\text{kon}^5$. 你先告诉他吧。（水语 张均如 1980:47）

你 先 说 给 他 先

sjen^3 “先”、 kon^5 “先” 分别是汉语借词、水语固有词，二者构成框式副词。

(7) $\eta^2\text{sin}^1\text{pai}^1\text{kun}^5$. 你先去。（毛南语 梁敏 1980:56）

你 先 去 先

sin^1 “先”、 kun^5 “先” 分别是汉语借词、毛南语固有词，二者构成框式副词。

(8) $\text{mu}^2\text{θen}^3\text{poi}^1\text{ti}^6\text{nu}^3$. 你先去。（标话 梁敏、张均如 2002:112）

你 先 去 先

θen^3 “先”、 ti^6nu^3 “先” 分别是汉语借词、标话固有词，二者构成框式副词。

(9) $\text{kən}^3\text{kja}^1\text{nu}^1\text{kwa}^5$ 更加热（靖西壮语 吕嵩崧 2017）

更加 热 过

$\text{kən}^3\text{kja}^1$ “更加”是晚近借入的汉语官话借词， kwa^5 “过”是汉语老借词，二者构成框式副词。

（二）框式比较标记

汉语普通话及北方方言的相关语序符合 OV 语言语序，汉语南方方言、壮侗语形容词（A，adjective）和比较基准（St，standard）的语序符合 VO 语言语序。相应地，它们的比较标记分别位于比较基准前、后。汉语南方方言和壮侗语借入汉语普通话的比较标记后，两个比较标记构成框式比较标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比较格标记居于比较基准后，受其影响，保安族汉语使用后置比较格标记表示比较，从普通话借入的比较标记则居于比较基准前，二者分别居于比较基准两侧，形成框式比较标记。

1. 南宁粤语的框式比较标记

(10) 南宁比桂林大过，睇地图就识哦（南宁比桂林大一些，看地图就知道了）。（林亦、覃凤余 2008:357）

^① 那坡官话是广西那坡县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转用的汉语西南官话变体。

^② 汪化云、姜淑珍（2020）及荆亚玲、汪化云（2021）表述为“框式状语”。

粤语固有的比较标记为“过”(吴福祥 2010)。“比”字句是晚近从普通话进入南宁粤语的,其结构为“比+St+A”(林亦、覃凤余 2008:357)。粤语为较典型的 VO 语言,“A+过+St”结构符合 VO 语言特征(见吴福祥 2012)。南宁粤语中,晚近进入的“比”和固有的“过”按自身固有位置分别居于属性谓语两侧,形成“比……过”框式比较标记。据 Yue(1997:368),香港粤语也有框式比较标记“比……过”。

2. 靖西壮语的框式比较标记

(11) $hai^3pi^5mo^5loŋ^1kwa^5lai^1$. 海比湖大得多。(笔者母语)

海 比 湖 大 过 多

kwa^5 是汉语老借词“过”,依汉语南方方言比较标记的固有位置居于比较基准之后; pi^5 是汉语官话借词“比”,按汉语官话比较标记的固有位置居于比较基准之前。二者形成框式比较标记“ $pi^5...kwa^5$ ”。

3. 保安族汉语方言的框式比较标记

(12) 牙齿比雪(阿/哈^①)看着/是还白(牙比雪还白)。(张竞婷 2015)

“看着/看是”是比较格标记,“比”是来自普通话的比较标记。二者在比较基准“雪”两侧按固有位置分布,构成框式比较标记“比……(阿/哈)看着/看是”。

4. 东乡族汉语^②的框式比较标记

(13) 我比他些高(我比他高)。他比我些能行(他比我更能干)。(莫超 2010)

根据莫超(2010)、张安生(2016),“些”是包括东乡族汉语在内的河湟方言的从格比较标记,“比”是从其他汉语方言吸收的晚起的前置词。二者按固有位置同现,形成框式比较标记“比……些”。

5. 干河滩保安语

(14) $nə\ lo\ comonə\ ərt\ šannə\ ʒgədzi\ jidzi\ gəʃ\ bidzo\ tut\ šan\ ndzAdzi\ la\ nəgə\ suŋfan\ o$.

这地犁二铲比头铲略微容易。(陈乃雄 1990)

陈乃雄(1990)指出, $ndzAdzi$ 是“仿照藏语 $yde-na$ 的词义翻译引入保安语的”,充当并列副动词。比较基准后接表示“看”的并列副动词 $ndzAdzi$,构成宾动结构,置于主句前,表“比较”。 $bidzo$ “比较”借自汉语方言,居于比较基准前。二者各按固有位置分布,形成框式比较标记“ $bidzo...ndzAdzi$ ”。

(三) 框式附置词

汉语的附置词包括动源附置词和名源附置词,动源附置词一般在名词短语前,即前置词。汉语南方方言、壮侗语的动源附置词也均为前置词。语序相同的语言或方言不具有形成框式结构的基础,故汉语普通话同汉语南方方言或壮侗语接触无法形成框式结构。但汉语西北方言和元代汉语因具有 OV 语序特征,其格标记在名词短语后,与普通话、元代通语或典型北方方言接触后,其后置格标记与外来的前置词可构成“前置词……格标记”结构的框式虚词。

1. 保安族汉语方言的框式附置词

(15) 我们从明天搭/塔拉做吧(咱们从明天起劳动吧)!(张竞婷 2015)

“搭/塔拉”是表起始时间义的从格后置格标记,“从”是来自普通话或其他汉语北方方

^① 据杨永龙(2014),保安族汉语方言比较句中“哈”的性质,各家看法不一,认为其为助词、介词(后置词)、后缀的均有。总体看来,大多认为其黏着性不强。

^② 东乡族汉语属于下文所述的河湟汉语,本文按相关引用文献原名称称说。

言的前置词。二者各按固有位置分别居于时间名词两侧,形成框式附置词“从……搭/塔拉”。

(16) 你用钢笔拉写(你用钢笔写)!(张竞婷 2015)

例(16)中,“拉”是凭借格标记,居于宾语后;“用”是来自普通话或其他汉语北方方言的前置词,居于宾语前。二者构成框式附置词“用……拉”。

根据张竞婷(2015)、杨永龙(2019),甘青河湟及其周边地区汉语方言(含保安族汉语方言)具有的SOV型语言系列特征是早期操SOV型语言的群体深度借用并转用汉语之后民族语特征的遗留,格标记是河湟汉语的突出特征之一。张竞婷(2015)指出,地道的保安族汉语方言没有前置词。所以,前置词应是从普通话或其他汉语北方方言借入的。

2. 元代汉语的框式附置词

(17) 我这里急慌忙那身起,大走到向他根底。(余志鸿 1992)

“根底”是后置词,也可作“根前”,对应于蒙古语的与/位格;“向”是汉语固有的前置词,居于宾语前。二者构成“向……根底”框式虚词。据余志鸿(1992),除“向”外,“于、对、从、在”也可充当此类框式虚词的前置词,构成框式虚词“于/对/从/在……根前/根底”。

(四) 框式否定标记

壮侗语为典型VO语序语言,否定标记居于中心语后;而汉语的否定标记则居于中心语前。在汉语的接触影响下,壮侗语形成框式否定标记。李云兵(2008:194)推测否定副词后置于动词、形容词的语序类型是侗央语群语言的早期语序。在汉语的影响下,也产生了框式否定方式,语序表现为AN+V+AN、AN+Adj+AN。李锦芳、吴雅萍(2008)及覃凤余等(2010)也认为壮侗语的否定句语序应是经历了“V+Neg>Neg₁+V+Neg₂>Neg+V”的过程,即存在一个框式否定标记的中间阶段。

(五) 元代汉语的其他框式虚词

元代汉语中,还存在框式假设标记“若……呵/时”,框式目的/原因标记“为/因……上/上头”,框式同事格标记“与/和……处/一处”等(余志鸿 1992; 祖生利 2001, 2004; 刘星 2017:38-41)。

据祖生利(2007)、李崇兴等(2009:259),蒙汉混合的语法,是元代汉语的显著特征。以上标记显然是OV语言的后置格标记与汉语居于中心语前的虚词构成的框式虚词。

三 框式虚词的特点

(一) 框式虚词可因接触产生

某类虚词(标记)语序有差异的两种语言或方言发生接触,二者接触后,功能相同的成分可能会从其中一种语言或方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或方言,后起成分未直接替换固有成分而与固有成分处于竞争并存状态时(至少接触之初如此),因两种语言或方言相应成分的句法位置不同,后起成分与固有成分在线性序列上均按其固有位置分布,才会形成框式虚词。也就是说,框式虚词的形成需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需要存在语言接触,甚至是密切的语言接触;二是形成接触的语言或方言存在语序类型差异。

就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有框式虚词的语言而言,大致分布在语言接触密切的地理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南地区)或历史时期(元朝时期)。具体来说,西北地区是阿尔泰语系语言、藏语和汉语发生接触的地域,而东南地区是壮侗语和汉语发生接触的区域;元代蒙古语和汉语曾

发生过非常密切的语言接触。

由于同 OV 语序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藏语以及典型 VO 语序的壮侗语长期而密切的接触，VO 语序的汉语在不同地域的变体呈现出不同的语序类型特征，汉语西北方言（如河湟汉语）具有了一系列 OV 语序特征，而汉语南方方言 VO 语序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与二者都有接触关系的普通话或汉语北方方言与它们在某些语序类型特征上也有些差异。典型 VO 语序的壮侗语与具有部分 OV 语序特征的汉语相接触，也使壮侗语呈现出部分 OV 语序特征。语序类型上的差异，即 OV 语序和 VO 语序，导致不同语言或方言经长期密切接触而产生了新结构——框式虚词。

金立鑫、于秀金（2012）指出的 VO 语言和 OV 语言涉及虚词的 3 对倾向性对立，即标句词和句子，时/体助动词和动词短语以及复数词和名词，我们没有观察到可形成框式虚词。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发生接触的语言必须在某些虚词（标记）语序有差异的条件下才能形成框式虚词，线性序列上位置一致的成分无法形成框式虚词。

（二）框式虚词强制性不高

同一语言或方言中，框式虚词往往只是具有竞争关系并可相互替代的多种表达形式中的一种，强制性不高，这是语言接触的特征之一。许多语言或方言中都有此类实例。

1. 南宁粤语的框式差比结构

据林亦、覃凤余（2008:354-357），南宁粤语有“S+A+过+St”“S+比+St+A”“S+A+St+数量词”“S1+S2, S1+A+过”“S1+S2, S1+多/加+A”“S+多+比+St+A”“S+多/加+A+过+St”“S+比+St+多+A”“S+比+St+A+过”“S+比+St+多+A+过”“S+多+比+St+A+过”“S+多+比+St+多+A+过”等 12 种差比结构。这一现象显然与语言接触有关。后 6 种中的“多/加……过”“比……多”“比……过”“比……多……过”“多比……过”“多比……多……过”都是框式差比结构，它们与非框式的差比结构在使用上都无强制性。

2. 处衢方言的框式副词结构

曹志耘等（2000:432）指出，处衢方言中，“添”“凑”用在动词之后，意义相当于“再”，表示动作继续进行，数量继续追加。动词前一般可以加“再”，也可以不加，动词前如果加了“再”，则后面的“添”“凑”可以省略。在处衢方言（如龙游话）中，“尔农食一碗添”“尔农再食一碗添”“尔农再食一碗”三种说法并存。“尔农食一碗添”是固有说法，是最早的层次；“尔农再食一碗添”^①是方言与普通话杂糅的形式，是第二层次；“尔农再食一碗”是后起的与普通话相同的说法，属第三层次。在处衢方言中，有的方言点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并存，有的点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并存，有的点只有第三层次，有的点（如龙游话）则是三个层次并存，但都没有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并存而缺少第二层次的情况，这也说明这类句子确实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层次，框式副词强制性不高。

3. 保安族汉语方言的格标记

张竞婷（2015）在讨论保安族汉语方言的从格、止格标记时说，“格标记的混用或许是格标记简化、弱化的过渡阶段体现，这个阶段格标记的使用不是严格对立的，它们之间分工不明确，使用较自由”，同时还指出保安族汉语方言格标记存在代际变异，并讨论了其格范畴标

^① 根据李荣（2002:4031），温州方言也有框式副词“再……添”，如可说“故事好听显，你再讲个添（故事很好听，你再讲一个）”。

记体系的简化走向,指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地域内,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语系语言广泛接触,通过借贷或底层残留的方式,汉语方言‘阿尔泰化’并出现了明显的格标记,但是随着外部历史条件的变化,汉语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强势,汉语方言又开始向普通话靠拢,它渐渐丢失阿尔泰语言的特征。”

4. 河湟汉语的附置词

根据杨永龙(2019),河湟汉语中,有的地方没有前置词,用后置词“哈”引出受事,“差点把人笑死了”要说成“差点人哈笑死给了”;而有的地方则用糅合的“把……哈”,说成“差点把人哈笑死给了”;有的地方把所有的“N哈”都换成“把N”。他所列的这几种形式实际就是强制性不高的几种形式演变的先后阶段。

5. 元代汉语的框式假设句和框式虚词

余志鸿(1992)指出元代汉语假设句的表示法有3种:PRE式(用“若”)、POS式(用“呵”或“时”)、PRE-POS式(用“若……呵”或“若……时”)。这3种结构显然分别是纯汉语式、蒙古语式和杂糅式,它们是前置词语言 and 后置词语言接触的结果,存在着语序选择,每一种结构强制性都不高。元代汉语的框式虚词在元代之后大量消失(祖生利 2004),也证明了框式虚词强制性不高这一特点。

(三)在语言接触更为复杂的区域,能够形成更加复杂的框式虚词

在语言接触更为复杂的区域,框式虚词可能会由两个以上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虚词构成,形成更加复杂的框式虚词。如“南宁比桂林大一些,看地图就知道了”这句话,南宁粤语可说成:

(18a) 南宁比桂林多大过,睇地图就识哦。

(18b) 南宁多比桂林大过,睇地图就识哦。

(18c) 南宁多比桂林多大过,睇地图就识哦。

例(18a)-(18c)中,“比”“过”“多比”“多”都是比较标记。“比”来自普通话,居于比较基准前;“过”为南宁粤语的固有词,居于比较基准后。它们的层次及其组成的框式差比结构“比……过”前文已述,此处不赘。南宁粤语的“多”作为比较标记,复制自壮语 *lai¹* “多”(吕嵩崧 2020)。南宁粤语与壮语的接触应早于其与汉语普通话的接触,所以“多”成为比较标记的时间应介于固有的“过”和晚近的“比”之间。

“多”被复制进南宁粤语并成为比较标记之初,其句法位置也同壮语的比较标记 *lai¹* 一样,与比较基准相邻并居于其前(吕嵩崧 2020)。之后,“比”从普通话借入,因语义强化的原因,“多”与“比”组成并列结构的比较标记“多比”,位于比较基准之前,原比较基准之前的“多”就变成可有可无的成分;随着普通话影响日渐加深,“比”的意义日渐显豁,“多比”中的“多”越来越不重要,遂脱落。“多”“比”“多比”等标记与南宁粤语原有的短差比式“S+A+过”(覃凤余、吴福祥 2009; 吴福祥、覃凤余 2010)中的“过”杂糅,遂形成“多比……多……过”“比……多……过”“多比……过”等复杂多样的框式比较标记。

四 对框式虚词演变的拟测

框式虚词可通过接触产生,由固有成分和借入成分共同构成。前文的观察也显示,在许多语言中,框式虚词与其他功能相同的形式或结构共存并用,强制性不高,因此可能只是相

应形式的一个发展阶段。基于此，我们对其发展、演变有如下推测：

（一）框式虚词最终可能会被模式语形式取代

从说话人角度讲，有些更新可能源于人类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倾向：用新颖的说法取代陈旧的说法以取得更强的语用力量（Lehmann，转引自刘丹青 2001a）。人们在接触到新的语言中与固有成分或较早形式意义一致但形式不同的成分时，可能会将新成分吸收进自己的语言。由于新成分一般来自强势语言或方言，会具有更显豁的意义，其语用功能也会更强。通过二者的共存并用，实现语义的强化。若它们在线性序列上位置不同，便会形成框式结构。

但是，既然框式虚词是叠床架屋的结构，必然产生语义冗余，违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此并不稳固，难以一直定型。新成分被吸收进来的同时，固有成分（或层次较早的成分）的语义也逐渐损耗。新成分和固有成分（或较早的成分）在历时状态下此消彼长，固有成分（或较早的成分）越发虚化，借入的新成分意义越发明确，相应结构便越发向模式语靠拢。

因此，从固有成分（或层次较早的成分）向模式语形式演变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中间阶段，即框式结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还并不短暂。其过程大致是：

固有形式（或层次较早的形式）→框式结构（固有形式或层次较早的形式与模式语形式杂糅形成的混合结构）→模式语形式

框式虚词形成之初，可以视为过度标记^①。据刘丹青（2001a），强化结构大多不能长期维持，旧的固有成分往往会从框式结构中脱落，最终变成以新代旧的更新现象。

因而，上述的演变或替换的过程也可以表述为：

固有形式（或较早形式）→强化（形成框式结构）→弱化（固有成分消失，代以新形式）

根据吴福祥（2012），这个过程称为“语序选择”，且“语序选择”跟语言接触有关；选择的最终结果，一般以转换为模式语的形式为终点。上文所述处衢方言的演变即证明了这一过程。框式虚词便是这一更替过程的中间阶段。再如，受汉语影响，壮侗语族语言动词（V）与方式副词（AM）的语序类型有如下演变轨迹：V+AM→V+AM+V→AM+V；形容词（Adj）与程度副词（AD）语序转换的过程为：Adj+AD→AD+Adj+AD→AD+Adj（李云兵 2008:153）。而 AM+V 和 AD+Adj 正是汉语北方方言的语序。吕嵩崧（201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汪化云、姜淑珍（2020）也证明了吴语区框式副词有向汉语官话形式演变的历时过程（包括后置状语被淘汰）。

据我们的观察，广南壮语的进行/持续体标记似乎已经消亡，而代之以副词来表达进行/持续义^②。例如：

（19）ti² tau³ ni² tsəŋ³ tsai³ lai² sin³. 他现在正在写信。（笔者田野调查语料）
他 现在 正在 写信

tsəŋ³ tsai³ “正在”是汉语借词，lai² sin³ “写信”后无进行体标记。而在与广南壮语同属南部壮语的靖西壮语中，“V+进行/持续体标记”“Adv+V+进行/持续体标记”“Adv+V”3种结构都存在。资料显示，各地壮语普遍存在进行/持续体标记（见邢公畹 1979；何霜 2007；陆天桥 2012；曹凯 2012:62；晏姝 2018:107；覃海恋 2009:67-68；黄阳 2010:78-79；吕嵩崧 2014:188-192）。广南壮语这一表现与壮语的普遍特征不符，最合理的解释是：广南壮语

^① 李荣（2002:3041）谈到“添”与“再”合用时，也说“有强调‘再’的意思”，说明框式结构确有强化作用。

^② 调查时，发音人说表达进行/持续义只有副词这一种方式，别无其他方式。

进行/持续体表达形式由固有形式发展为框式虚词,最后固有的进行/持续体标记脱落而仅采用了与当代官话一致的副词形式,即:单纯进行/持续体标记→框式虚词→前置副词。

有关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及民族语言框式虚词演变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欠缺,其演变过程和规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总结。但祖生利(2004)指出,明初蒙古语影响势力退出后,元代汉语直译蒙古语表示原因和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形成的后置词“上/上头”随之消亡,汉语原有的前置因果连词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观察也可为我们的拟测提供佐证。

(二) 框式副词的后项常常演变成一个更虚的成分

前文已述,框式副词形成之初,目的在于语义强化。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同现会导致意义冗余,层次较浅的成分语义比层次较深的成分(固有或较早借入的成分)更为显豁,意义相对模糊的成分会逐渐弱化。汉语南方方言和壮侗语框式副词的后项一般是固有成分或层次比前项更早的成分,因此,后项语义会逐渐弱化,演变成更虚的成分。

1. 靖西壮语的例证

tsai³/jəu⁴...them¹“再/又……添”是框式副词。them¹“添”是借自汉语南方方言的老借词,借入后充当表反复的频率副词^①,按壮语副词固有位置居于中心语后;汉语新借词 tsai³“再”、jəu⁴“又”按其在现代汉语中的位置居于中心语前。但我们却观察到如下两例:

(20) tu¹ma¹tsai³/jəu⁴hau⁵mɔi⁵them¹. (这条)狗又叫了。

只 狗 再 又 叫 新 添

例(20)中,them¹前添加表再次的mɔi⁵,说明them¹的“反复”义弱化,不然不必加mɔi⁵。此时“添”已不表“再”,而是表“而且”。根据李荣(2002:4031),各地汉语方言的“添”并无“而且”义,说明靖西壮语mɔi⁵them¹中them¹的词义已从借入时的“再”演变成“而且”。当一个词负载的核心语义弱化时,便会衍生出多种新义。

(21) pan²pei³ them¹mɔi⁵. 又是这样。

成 这样 添 新

例(21)中,them¹不与其他成分构成表“反复”的框式副词时,可以后加固有词mɔi⁵“新”加以强化,这表明其“反复”义已极弱。与其“反复”义弱化相伴的是语音弱化,them¹可读为hem¹、him¹,声、韵都已明显弱化。

此外,靖西壮语框式副词tsan¹...ki³lai⁶“确实”和thai³...lai¹“太”的后项也显示出语义弱化,进一步虚化的迹象。tsan¹...ki³lai⁶中,ki³lai⁶“确实”是固有词,tsan¹“真”是汉语老借词。ki³lai⁶本充当后置状语,但在当代靖西壮语中,“确实”义主要由tsan¹体现。实际口语中,ki³lai⁶音长变长,说明其语义已弱化,更像是语气助词。框式程度副词thai³...lai¹中,lai¹“多”是固有词,thai³“太”是汉语新借词。在当代靖西壮语口语中,程度义主要由thai³体现。lai¹调值本为53,在实际口语中,其初始音高高于惯常的5度,音长加长,体现出语义弱化而向语气助词演变的语音特征。

2. 汉语方言的例证

多处粤语存在框式副词“先……先”。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话、新加坡广府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广府话、菲律宾马尼拉广府话、越南胡志明市广府话、柬埔寨金边广府话、泰国曼

^① 这个功能应该是直接来自汉语南方方言。据李荣(2002:4031),“添”在绩溪、温州、金华、萍乡、广州等地方言中皆有“再”义。

谷广府话、缅甸仰光台山话都可说“你先行先”。陈晓锦(2014:1115-1117)观察到,除新加坡广府话外,这些粤语变体一般既可说“你先行”,也可说“你行先”,并由此推测“你行先”是粤语的固有表达。

“先”居后是较早的形式,这应该是事实。与居前的纯粹表示时间、次序先后的“先”不同,居后的“先”有一些较虚的意义。邓思颖(2006b)综合各家意见,认为这是个加强语气的“先”,语音一般拖长,是“句末助词、语气词”,功能上用作加强提问的语气,跟普通话“到底”的意思差不多,“先”或许带有质疑、不满、不耐烦等义,跟时间先后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居后的“先”与典型的时间副词并不相同,它已具有了一些更虚的功能。我们的判断是:粤语受普通话影响引入了居前的“先”,此“先”意义更为显豁;居后的“先”逐渐虚化,逐渐产生一些较虚的意义^①。

百色粤语的“再……过”本是框式副词,表“重复,再次”。但在“我再去过”中,“重复,再次”义主要由“再”承担,“过”已不完全表重复,而具有了一定的尝试义。

广西那坡官话是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转用的汉语官话变体。那坡壮语的否定标记主要是框式的 $mei^2 \dots nau^5$, mei^2 应该是汉语老借词“未”, nau^5 为固有否定标记。由于 mei^2 来自更强势的汉语,意义更为显豁, nau^5 语义逐渐弱化,向语气助词演变^②。壮语口语中,表强调的时候, nau^5 也会拖长,与语气助词差异不大。因此,壮族转用汉语官话时,根据语感,把 nau^5 作为语气助词带入官话。因壮语第 5 调与官话借词上声对应,因此在那坡官话中读 $na:u^3$,如“不是他□^③ $na:u^3$ (不是他)”。那坡官话的这个否定句末尾的语气助词“□ $na:u^3$ ”,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应该是来自壮语框式否定标记中居后的 nau^5 。

与这些例证相似,汪化云、姜淑珍(2020)也指出,吴语后置状语趋于虚化,甚至重新分析为语气词,其演变轨迹为:语言接触或类推产生后置状语(有的仍单用)→同类方言接触导致后置状语产生词形叠置和叠合的变异→异类方言接触产生前置状语的叠置→前、后置状语同现构成框式状语→后置状语语义赘余虚化为语气词→后置状语被淘汰。汉语南方方言和壮侗语相应结构的演变与此近似。

因我们缺乏对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观察,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框式副词后项的弱化及脱落还仅限于汉语南方方言和壮侗语。

五 结 语

框式虚词可因语言接触历时形成,形成接触的语言应存在语序类型的差异。框式虚词的多个构成成分可以是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框式虚词使用的强制性不高,一般处在固有形式向模式语形式演变的中间阶段,其演变过程可归纳为:固有形式(或较早形式)→固有成分(或较早形式)与借入成分形成的框式虚词→框式虚词后项语法化,演变成更虚的成分→后项脱落→模式语形式。从固有形式到形成框式虚词,最终被模式语形式取代,可以理解为是语义强化(过度标记)再语义弱化(准确标记)的过程。

^① 何霜(2008)指出,壮语 kom^5 “先”有语气词功能。我们认为,其同粤语可能是平行演变,也可能存在语法复制关系。

^② 李锦芳、吴雅萍(2008)指出,固有的 Neg_2 语义度会减弱,发生语法化。

^③ “□”表示有音无字。

壮侗语框式指示词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很可能与框式虚词平行,壮语“借词+固有词”同义实语素组合语序的规律很可能与本文讨论的框式虚词存在某种机制上的联系。因此,框式虚词研究对这些语言现象的深入挖掘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曹广顺、遇笑容. 2010.《中古译经、元白话语法研究与语言接触》,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辑)第77-8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 曹 凯. 2012.《壮语方言体标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 曹志耘、秋田裕幸、太田斋等. 2000.《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
- [4] 陈乃雄. 1990.《保安语的演变轨迹》,《民族语文》第3期.
- [5] 陈晓锦. 2014.《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广东有限公司.
- [6] 邓思颖. 2006a.《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汉语学报》第2期.
- [7] 邓思颖. 2006b.《粤语疑问句末“先”字的句法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
- [8] 何 霜. 2007.《忻城壮语“ju³³”的语法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 [9] 何 霜. 2008.《忻城壮语语气词 kom²³¹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10] 黄 阳. 2010.《靖西壮语语法》,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 金立鑫、于秀金. 2012.《从与 OV-VO 相关和不相关参项考察普通话的语序类型》,《外国语》第2期.
- [12] 荆亚玲、汪化云. 2021.《杭州方言中的框式状语》,《语言研究》第2期.
- [13] 李崇兴、祖生利、丁 勇. 2009.《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4] 李锦芳、吴雅萍. 2008.《关于侗台语的否定句语序》,《民族语文》第2期.
- [15] 李 荣主编. 2002.《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16] 李云兵. 2008.《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梁 敏. 1980.《毛难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8] 梁 敏、张均如. 2002.《标话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9] 林 亦、覃凤余. 2008.《广西南宁白话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刘丹青. 2001a.《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语言研究》第2期.
- [21] 刘丹青. 2001b.《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载史有为主编《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第222-244页,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22] 刘丹青. 2002.《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当代语言学》第4期.
- [23] 刘 星. 2017.《西北方言与元白话特殊语法比较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4] 陆天桥. 2012.《试论武鸣壮语的体范畴》,《语言科学》第6期.
- [25] 雒 鹏. 2004.《河州话语法——语言接触的结果》,《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
- [26] 吕嵩崧. 2014.《靖西壮语语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7] 吕嵩崧. 2017.《靖西壮语方式副词、程度副词与谓语的语序模式及其历时动因》,《民族语文》第4期.
- [28] 吕嵩崧. 2019.《壮语“完毕”义语素的语法化及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方言》第4期.
- [29] 吕嵩崧. 2020.《壮语 lai¹ 的语义演变及其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民族语文》第3期.
- [30] 莫 超. 2010.《东乡族汉语中“些”、“有”、“啦哒/哒啦”、“阿哈”的用法及来源》,《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
- [31] 覃凤余、黄 阳、陈 芳. 2010.《也谈壮语否定句的语序》,《民族语文》第1期.

- [32] 覃凤余、吴福祥. 2009.《南宁白话“过”的两种特殊用法》，《民族语文》第3期。
- [33] 覃海恋. 2009.《武鸣罗波壮语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4] 汪化云、姜淑珍. 2020.《吴语中的后置副词状语》，《中国语文》第2期。
- [35] 汪化云、占小璐. 2014.《玉山方言中的框式状语》，《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1期。
- [36] 王丹丹. 2018.《常山方言的框式状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 [37] 吴福祥. 2010.《粤语差比式“X+A+过+Y”的类型学地位——比较方言学和区域类型学的视角》，《中国语文》第3期。
- [38] 吴福祥. 2012.《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和断想》，《中国语文》第4期。
- [39] 吴福祥、覃凤余. 2010.《南宁粤语短差比式“X+A+过”的来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40] 邢公畹. 1979.《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上)》，《民族语文》第2期。
- [41] 晏 姝. 2018.《崇左左州壮语参考语法》，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2] 杨永龙. 2014.《青海民和甘沟话的多功能格标记“哈”》，《方言》第3期。
- [43] 杨永龙. 2019.《甘青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及其产生途径》，《民族语文》第2期。
- [44] 余 珩. 2017.《表肯定判断“X然”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九辑)第2期第148-162、382-38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45] 余志鸿. 1992.《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民族语文》第3期。
- [46] 张安生. 2016.《甘青河湟方言的差比句——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视角》，《中国语文》第1期。
- [47] 张竞婷. 2015.《保安族汉语方言格标记及其演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 [48] 张均如. 1980.《水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49] 祖生利. 2001.《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语言研究》第4期。
- [50] 祖生利. 2004.《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原因后置词“上/上头”》，《语言研究》第1期。
- [51] 祖生利. 2007.《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当代语言学》第1期。
- [52] Yue, Anne O. 1997. Syntactic change in progress, Part I: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载余蔼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第329-375页，东京：内山书店。

Contact-induced Discontinuous Function Words and Their Theoretical Evolution

LÜ Songsong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two languages or dialects with different word orders may induce the emergence of discontinuous function words, which is the intermediate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 words from native forms or earlier forms to forms in the model languages.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discontinuous function word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533000 百色 百色学院澄碧校区)

【本文责编 胡鸿雁】